

钱宾四先生  
学术文化讲座

钱宾四

# 中国文化的发展过程

许倬云 著

中華書局

钱宾四先生  
学术文化讲座

錢  
穆

# 中国文化的发展过程

许倬云 著

中華書局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文化的发展过程/许倬云著. —北京:中华书局,2017.1  
(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  
ISBN 978-7-101-12117-9

I.中… II.许… III.文化史-中国 IV.K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12323号

©香港中文大学 1992

本书由香港中文大学拥有所有版权。

本版限在中国大陆发行。

- 
- |       |                                                                                                                           |
|-------|---------------------------------------------------------------------------------------------------------------------------|
| 书 名   | 中国文化的发展过程                                                                                                                 |
| 著 者   | 许倬云                                                                                                                       |
| 丛 书 名 | 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                                                                                                               |
| 责任编辑  | 聂丽娟                                                                                                                       |
| 出版发行  | 中华书局<br>(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100073)<br><a href="http://www.zhbc.com.cn">http://www.zhbc.com.cn</a><br>E-mail:zhbc@zhbc.com.cn |
| 印 刷   | 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
| 版 次   | 2017年1月北京第1版<br>2017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
| 规 格   | 开本/889×1194毫米 1/32<br>印张4½ 字数70千字                                                                                         |
| 印 数   | 1-8000册                                                                                                                   |
| 国际书号  | ISBN 978-7-101-12117-9                                                                                                    |
| 定 价   | 30.00元                                                                                                                    |
-

# 总 序

金耀基

今年是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创校六十周年，新亚书院之出现于海隅香江，实是中国文化一大因缘之事。六十年前，几个流亡的读书人，有感于中国文化风雨飘摇，不绝如缕，遂有承继中华传统、发扬中国文化之大愿，缘此而有新亚书院之诞生。老师宿儒虽颠沛困顿而著述不停，师生相濡以沫，弦歌不辍而文风蔚然，新亚卒成为海内外中国文化之重镇。1963年，香港中文大学（下简称“中文大学”或“中大”）成立，新亚与崇基、联合成为中大三成员书院。中文大学以“结合传统与现代，融会中国与西方”为愿景。新亚为中国文化立命的事业，因而有了一更坚强的制度性基础。1977年，我有缘出任新亚书院院长，总觉新亚未来之发展，途有多趋，但归根结底，总以激扬学术风气、树立文化风格为首要。因此，我与新亚同仁决意推动一些长期性的学术文化计划，其中以设立与中国文化特别有关之“学术讲座”为重要目标。我对新亚的学术讲座

提出了如下的构想：

“新亚学术讲座”拟设为一永久之制度。此讲座由“新亚学术基金”专款设立，每年用其孳息邀请中外杰出学人来院作一系列之公开演讲，为期两周至一个月，年复一年，赓续无断，与新亚同寿。“学术讲座”主要之意义有四：在此“讲座”制度下，每年有杰出之学人川流来书院讲学，不但可扩大同学之视野，本院同仁亦得与世界各地学人切磋学问，析理辩难，交流无碍，以发扬学术之世界精神。此其一。讲座之讲者固为学有专精之学人，但讲座之论题则尽量求其契合关乎学术文化、社会、人生根源之大问题，超越专业学科之狭隘界限，深入浅出。此不但可触引广泛之回应，更可丰富新亚通识教育之内涵。此其二。讲座采公开演讲方式，对外界开放。我（个人）相信大学应与现实世界保有一距离，以维护大学追求真理之客观精神，但距离非隔离，学术亦正用以济世。讲座之向外开放，要在增加大学与社会之联系与感通。此其三。讲座之系列演讲，当予以整理出版，以广流传，并尽可能以中英文出版，盖所以沟通中西文化，增加中外学人意见之交流也。此其四。

新亚书院第一个成立的学术讲座是“钱宾四先生学术

文化讲座”。此讲座以钱宾四先生命名，其理甚明。钱穆宾四先生为新亚书院创办人，一也。宾四先生为成就卓越之学人，二也。新亚对宾四先生创校之功德及学术之贡献，实有最深之感念也。1978年，讲座成立，我们即邀请讲座以他命名的宾四先生为第一次讲座之讲者。八十三岁之龄的钱先生缘于对新亚之深情，慨然允诺。他还称许新亚之设立学术讲座，是“一伟大之构想”，认为此一讲座“按期有人来赓续此讲座，焉知不蔚成巨观，乃与新亚同跻于日新又新，而有其无量之前途”。翌年，钱先生虽困于黄斑变性症眼疾，不良于行，然仍践诺不改，在夫人胡美琦女士陪同下，自台湾越洋来港，重踏上阔别多年的新亚讲堂。先生开讲的第一日，慕其人乐其道者，蜂拥而至，学生、校友、香港市民千余人，成为一时之文化盛会。在院长任内，我有幸逐年亲迎英国剑桥大学的李约瑟博士、日本京都大学的小川环树教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狄百瑞教授和中国北京大学的朱光潜先生，这几位在中国文化研究上有世界声誉的学人的演讲，在新亚，在中大，在香港，都是一次次文化的盛宴。1985年，我卸下院长职责，利用大学给我的长假，到德国海德堡做访问教授，远行之前，职责所在，我还是用了一些笔墨劝动了美国哈佛大学的杨联陞教授来新亚做八五年度讲座的讲者。这位自嘲为“杂家”、被汉学界奉为“宗匠”的史学家，在新亚先后三次演讲中，对中国文化中“报”、“保”、“包”三个关键词作了

渊渊入微的精彩阐释，从我的继任林聪标院长信中知道杨先生的一系列演讲固然圆满成功，而许多活动，更是多姿多姿。联陞先生给我的信中，也表示他与夫人的香港之行十分愉快，还嘱我为他的讲演集写一跋。这可说是我个人与“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画上了愉快的句点。此后，林聪标院长、梁秉中院长和现任的黄乃正院长，都亲力亲为，年复一年，把这个讲座办得有声有色。自杨联陞教授之后，赓续来新亚的讲座讲者有余英时、刘广京、杜维明、许倬云、严耕望、墨子刻、张灏、汤一介、孟旦、方闻、刘述先、王蒙、柳存仁、安乐哲、屈志仁诸位先生。看到这许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杰出学者，不禁使人相信，东海、南海、西海、北海，莫不有对中国文化抱持与新亚同一情志者。新亚“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的许多讲者，他们一生都在从事发扬中国文化的事业，或者用李约瑟博士的话，他们是向同代人和后代人为中国文化做“布道”的工作。李约瑟博士说：“假若何时我们像律师辩护一样有倾向性地写作，或者何时过于强调中国文化贡献，那就是在刻意找回平衡，以弥补以往极端否定它的这种过失。我们力图挽回长期以来的不公与误解。”的确，百年来，中国文化屡屡受到不公的对待，甚焉者，如在“文化大革命”中，中国传统的文化价值，且遭到“极端否定”的命运。正因此，新亚的钱宾四先生，终其生，志力所在，都在为中国文化招魂，为往圣继绝学，而“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

之设立，亦正是希望通过讲座讲者之积学专识，从不同领域，不同层面，对中国文化阐释发挥，以彰显中国文化千门万户之丰貌。

“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讲者的演讲，自首讲以来，凡有书稿者，悉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印行单行本，如有中、英文书稿者，则由中文大学出版社与其他出版社，如哈佛大学出版社、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联同出版。三十年来，已陆续出版了不少本讲演集，也累积了许多声誉。日前，中文大学出版社社长甘琦女士向我表示，讲座的有些书，早已绝版，欲求者已不可得，故出版社有意把“讲座”的一个个单行本，以丛书形式再版问世，如此则搜集方便，影响亦会扩大，并盼我为丛书作一总序。我很赞赏甘社长这个想法，更思及“讲座”与我的一段缘分，遂欣然从命。而我写此序之时，顿觉时光倒流，重回到七八十年代的新亚，我不禁忆起当年接迎“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的几位前辈先生，而今狄百瑞教授垂垂老矣，已是西方新儒学的鲁殿灵光。钱宾四、李约瑟、小川环树、朱光潜诸先生则都已离世仙去，但我不能忘记他们的讲堂风采，不能忘记他们对中国文化的温情与敬意。他们的讲演集都已成为新亚书院传世的文化财产了。

二〇〇九年六月二十二日



# 目 录

|                    |    |
|--------------------|----|
| 迎许倬云教授到新亚书院讲学（林聪标） | 1  |
| 序：中国史与世界史的若干省思     | 1  |
| 第一讲 中国文化的形成        | 1  |
| 第二讲 中国文化的演化        | 21 |
| 第三讲 中国文化的转变        | 47 |
| 附录一 论雅斯贝斯轴心时代的背景   | 66 |
| 附录二 中国文化演变周期概论     | 94 |

# 迎许倬云教授到新亚书院讲学

林聪标

新亚书院的创立是基于几位创校先贤对高等教育的理想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信念。创校初期筚路蓝缕，经济物质条件极端贫乏，在“手空空，无一物”的环境下，他们仍然以“千斤担子两肩挑”的豪情，为继承中华传统，以发扬及创新中国文化伟大抱负为己任。钱宾四先生创建了新亚书院，并且担任了十五年的院长，为新亚书院的发展奠定了一个长久垂远的基础，也在香港高等教育史上树立了一个里程碑。

金耀基先生在任新亚书院院长期间，为发展新亚传统特色，构想了多种推动长期性学术文化活动的计划；其中以设立与中国文化有关的“学术讲座”为首要目标，并发起“新亚学术基金”的筹募运动。在多个学术讲座的构想中，首先成立“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

“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首次讲座，于1978年10月12日举行，当时邀请钱宾四先生由台湾来港亲自主持。

讲题是“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一连六讲，成为当时学术界一大盛事。

本讲座自 1978 年举办以来，已达十届。先后有李约瑟（Joseph Needham）先生、小川环树（Dgawa Tamaki）先生、狄百瑞（William. Theodore de Bary）先生、朱光潜先生、陈荣捷先生、杨联陞先生、余英时先生、刘广京先生、杜维明先生。每届讲座，不但是新亚以至中大（香港中文大学）的校园盛事，也是香港学术界的盛事。

今年适值钱宾四先生逝世一周年纪念，很难得邀请到与钱宾四先生同乡的著名当代史学家许倬云先生来校主讲。许先生自幼即深受宾四先生启发，在学术观点上，对宾四先生特别仰慕推崇，不仅是当今学术界的适当人选，而且更具有特别的纪念意义。

—

许倬云教授，江苏无锡人，1930 年出生于福建厦门鼓浪屿。中学就读于无锡辅仁中学，承袭了江南无锡“读书切实、做事认真”的学风传统，此时即致力于研读同乡前辈钱宾四先生的名著《国史大纲》，私淑钱先生，这对他日后的史学根基与治学态度有很大的影响。1953 年及 1956 年，许先生先后毕业于台湾大学历史系及文科研究所；随即进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担任助理研究员。

在台大就学期间，许先生随李宗侗先生治社会史、李济之先生治考古学，随董作宾先生治年历、历法，随劳贞一先生治秦汉史，随凌纯声先生、芮逸夫先生治民族学，随沈刚伯先生治西洋史；在名师的教导下，奠定了深厚的治学基础。1962 年取得美国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台湾担任史语所副研究员（1962—1967 年）、研究员（1967—1970 年），并任台湾大学历史系系主任及历史研究所所长（1962—1970 年）及教授（1965—1970 年）。1970 年应聘赴美任匹兹堡大学历史系及社会学系教授，1983 年荣任同校校聘讲座教授（University Professor）迄今；1980 年获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1986 年获选为 Phi Beta Kappa 荣誉会员。

## 二

以学术造诣言，许先生钻研中国五千年历史，娴熟近代西方科学，学问面甚为广阔。从比较严格的学术范围来说，他是一位中国古代史家，专精周、秦、汉三个朝代。他的主要著作中有专书三种：即 *Ancient China in Transition*（《先秦社会史论》）、*Han Agriculture*（《汉代农业》）和《西周史》；论文集二种：《求古编》《中国古代文化的特质》。《求古编》收入至 1980 年发表的论文，以后仍不断有论著在学术期刊登载。估计他的中文著作达百万言，英文专书及论

文无数，以六十岁的盛年，累积如此大量的学术成绩，可见其生命力之活泼和创造欲之旺盛。

### 三

许先生的学术论著范围以两周到两汉为主，所探讨的课题环绕着政治结构、地方力量和农业经济。周是中国古典文明完成的时代，也是传统两千年文化的基础和泉源；汉是传统政治制度与社会结构形成的时期，二千年来政治社会的基本骨架在乎其中。所以这两个段落是了解中国历史基本性质最紧要的环节。许先生曾说，他的研究范围牵涉到三种时期，一是形成期（formation），一是定型期（crystallization），一是转变期（transformation）；前者见性格的发展方向，中者是特殊个性的定型，后者则为过渡的过程。这三个时期的研究，体现在许先生三种主要的专著中：《西周史》主要探讨以文化为概念之华夏民族的形成期；《先秦社会史论》则讨论古代世界过渡到普世国家（universal state）和普世文化（universal culture）的过程；《汉代农业》更进一步分析维持中国这个普世国家两千余年传统社会的经济基础结构。

许先生的历史论著主要探讨中国历史上两大课题，一是中央政府与地方社会力量的冲突和融合，二是农业与商业，亦即城市与乡村的互补与联系关系。近年来，他针对

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指出亲缘团体、精耕细作与文官制度为构成中国历史发展的三原色。许先生认为中国不像两河流域那种以地缘为结合的方式，而中国在商代的政治单位是两种平行的系统，一是地区性的邑，一是亲缘性的族；到了西周以宗法取胜，邑变成族的附属品。周代选择以血缘来结合人群，这个选择形成中国很大的特色，中国政团的扩大就是以亲缘的团体扩展而成的。反映在词汇上是“天下一家”，国与家不分，这种扩张可以造成普世的帝国，而这个普世的帝国是建立在亲缘关系上的。亲缘关系的排他性很强，但中国历史可以超越这种排他性而产生“民胞物与”、“民吾同胞”的观念。中国以亲缘来带动扩张的需求，这是其他文明体系所没有的特色，表现在社会关系上，亲缘关系是所有关系的基因。

论中国社会的经济基础，精耕细作与市场经济如车之两轮相辅并行。许先生认为中国农村并非遗世孤立、自给自足的经济体，而是坐落在广大市场网络的小环节；透过网络的勾连，各环节互通声气。小网络汇集于小镇，大网络以城市为纲，大小环节既有生产与消费的关系，疏通的网络自然就产生物品与人力的调节作用。因此，商业未必是压迫农业的罪魁，城市也未必成为剥削乡村的祸首。他更进一步指出：

自从韦伯谈到资本主义以后，大家往往从伦理、

工作意愿等方面去讨论，而疏忽了纯经济的角度。为什么中国没有走向资产化？在纯经济的角度，也就是从精耕农业的角度来看，资金一方面是分散的，不容易集中；另一方面，资金长期束缚在小块农地上。精耕细作的农业，经常需要改良土壤以维持生产力，需要长期的资金投入，大量资金遂没法转化为别的东西，这是中国没有产生资本主义的重要因素之一。我们不能单单讨论观念就忘记纯经济的因素；反之，经济行为脱不开观念。所以虽然我们谈的是农业经济、精耕细作，还是要提醒大家，了解任何一个历史现象没法完全切开，都要联系在一起的。（《中国古代文化的特质》，第33页）

许先生强调的另一个中国文化的基因特色是文官制度（bureaucracy）。中国的文官组织来源久远，完备、复杂的文官系统理论早在《韩非子》中就出现了。在长期的演变过程中，文官制度是国家与社会斗争的制衡角色。中国的文官制度不仅有工具的合理性，而且有儒家意念渗透其中，这是韦伯在讨论西欧自十六世纪以来的文官制度所缺少的一环。儒家意念如果只当作意念系统，可能会成为教条，任何东西若变成教条就会神秘化，走上信仰的途径，而不走理性辩论的途径。儒家意念作为目的而论，可以相当于基督教意念，是一种信仰；可是反过来讲，儒家意念并不

是上天的神谕，而是经世的使命，在这点上儒家意念的神秘性并不强。从这角度看，目的的理性与工具的理性配合，使中国文官系统在国家与社会的拉锯战中，不但举足轻重，而且成为国家和社会之间的联系力量，这个特色是中国以外的史学家在讨论文官制度时未能理解到的。

## 四

自从早年运用社会流动（social mobility）的概念来解析春秋战国的变革期以来，许先生近三十年中努力倡导借用社会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历史，尤其是社会史。他指点学子们注重与检讨马克斯·韦伯（Max Weber）、艾森斯塔德（S. N. Eisenstadt）、施坚雅（William Skinner）、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等人的理论，而他本人更是应用社会科学理论来研究历史的成功例子。他常自谓“杂家”，颇有“泰山不辞土壤，河海不捐细流”的气概。方法本是双刃刀，善用可以制敌，不善用反而伤己。这些年来台湾以社会科学方法研究史学的结果或成或败，其功过得失归之个别学者的机缘，但许先生有倡导之功，则毋可否认。他的研究取向从近代中国社会史学来看是颇有意义的。近代中国社会史的研究以马克思主义学派为大宗，许先生的努力推介新方法和新理论，多少夺回一些园地，这种力挽狂澜之功，也是不容抹杀的。



## 五

1962年许先生荣获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这是台大历史系毕业生取得博士学位的第一人。他的博士论文《中国古代社会变动之研究》得到海内外学术界极高的评价与赞许（这篇论文修订后在1965年由斯坦福大学出版，即 *Ancient China in Transition* 一书，至今仍为治中国史的学子所必读的著作）。许先生在完成学位后，立刻回台湾，任职于台湾“中研院”史语所及台大历史系。在主持台大历史系系务的八年间，许先生身处强大的政治压力之下，仍然坚毅地抗衡权威势力，致力维护学术研究的独立自由，得以开创出台湾这二十多年来历史学研究教学的新方向，可说是厥功甚伟，弥足矜式。

在此期间，许先生一方面辅助史语所所长李济之先生与台大文学院院长沈刚伯先生，努力提升台湾的学术研究；另一方面，他又致力于革新台大历史系的课程与教学，开启了历史系每一断代史分由二人以上讲授的先例，这种平行与交叉的课程设计，使历史系的课程安排有了断代连贯的新义。同时通过开日本、韩国、蒙古、土耳其、越南及东南亚各地区历史课程，着重汉民族与各周边文化圈的发展关系；更以美国、英国、俄国、印度等别国史的讲授，进一步把中国史与世界史连贯结合起来。